

故事者，孫敬修

从皇叔到全國人大代表

愛新覺羅毓濤的傳

梨園伯樂羅癭公

土成拳祖王步齋

石叻祖用藍天第一人奉國鑄

京華奇人錄

吳宓傳統文化的浪漫主義者

宗白大師

印象中的金岳霖

性博士張愛玲

為賽金花寫書的高鴻達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会编 舒乙主编

京華奇人錄

張中行題



北京出版社

目 录

序	舒 乙 (1)
金岳霖先生	汪曾祺 (1)
刘文典的故事	黄廷复 (6)
怀英伯 念恩师	
——追忆英千里教授	(台湾)韩拱辰 (20)
吴宓——传统文化的浪漫主义者	孙敦恒 (33)
忆恩师沈兼士	葛信益 (42)
我的祖父陆宗达	陆 昕 (49)
温特教授	
——记一位洋“北京人”	刘 焯 (62)
余嘉锡先生	李振生 (70)
坚信笃行的佛学家熊十力	张中行 (75)
宗月大师	舒 乙 (81)
易万卷庐主人卢松安	陈长慧 (90)
能诗善画的瑞光和尚	傅耕野 (102)

忆寄水兄	沈彭年	(106)
印象中的金受申	邓友梅	(111)
金受申和金寄水		
——与邓友梅兄笔谈	吴晓铃	(118)
金受申到市文联	端木蕻良	(120)
张醉丐先生二三事	吴小如	(122)
王柱宇其人	周临霞	(126)
工笔花鸟画大师于非闇	胡絮青 舒 乙	(129)
指画名家林彦博	傅耕野	(134)
寿石工先生的“人”与“文”	刘叶秋	(141)
齐白石的女弟子刘淑度	王永斌	(146)
篆刻家刘博琴	叶祖孚	(152)
魏长青和他的“八宝印泥”	飞 鸿	(157)
裱画名匠张贵桐	张书刚	(160)
辜鸿铭	张中行	(163)
性博士张竞生	陈漱渝	(173)
并非传奇的故事		
——忆董鲁安先生	李寿朋	(186)
张子高先生与《墨苑杂说》	刘叶秋	(193)
为赛金花写书的商鸿逵	周临霞	(196)
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先生	张必忠	(199)
北京史专家张次溪	张叔文	(208)
故事爷爷孙敬修	肖 君	(216)
从“皇叔”到全国人大代表		
——爱新觉罗·载涛外传	辛 芳	(226)

记溥西园先生 朱家潘 (242)
多才多艺的溥雪斋先生 李振生 (250)

我的父亲齐如山 齐 香 (255)
梨园伯乐罗瘦公 刘东升 (268)
春阳友会的创始人——樊棣生 樊达扬 (275)

韧的追求

——父亲张伯驹的一生 张传彩 (285)
文物鉴赏家张效彬 徐小燕 (291)
傅惜华与碧藻馆藏书 傅耕野 (301)
冯公度二三事 刘季人 (308)
古墨鉴藏家尹润生 张颖昭 (314)
百一主人苏宗仁先生 苏珂孙 (322)
文物鉴定专家邱震生 叶祖孚 (329)

反袁先驱陈翼龙 陈致宽 (335)
辛亥革命中的无名英雄——王崇义 常 华 (342)
击柝警世之怪杰——李六更 阎亚男 农伟雄 (346)

提倡体育运动的活榜样

——记马约翰教授 黄延复 (353)
大刀张宝忠 马铁汉 (359)
大成拳祖王芑斋 张雅宗 (364)
“天下第一手”
——记武术大师孙禄堂 孙叔容 (368)
高等学府的国术先驱——李剑秋 黄延复 (377)
飞向祖国蓝天第一人——秦国镛 张必忠 (388)

褚连祥与西来顺	穆知平 (392)
“北玉一怪”王树森	张雅宗 (403)
编后记	(410)

序

舒 乙

早就有这个想法，编一本北京奇人录，一定诱人。

奇人，是与不同的人，有奇才的人，出类拔萃的人，总之，是有专长、有造诣、有突出贡献的人，在某一时期，他们都曾是赫赫有名的，甚至是风靡一时的人物。

在北京，占天时地利，这样的现代奇才相当多。

应当把他们的事迹记载下来，趁着还有人记得他们。

这也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因为人才本身便是世上最珍贵的财富。

奇人录，就是人才录。

于是，两年前，这本书的选题便被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看中了。排定撰写对象名单后，决定组织力量分别编写。写了两年，凑起来一看，还挺像样子。一是作者阵容中不乏北京知名的作家和学者；二是被写的人物都个个戳得住，用一句前些年流行的话，都是“响当当”的。

编书时坚持两个不强求：体例不求统一，风格不求统一。小至写两三事，大至写成一个小传，都可以；是散文是随笔是记事

都欢迎。就是有一条必须坚持：必得真有其事，亲眼所见最好；要实录，不准编造。

对特别有名的，像梁启超、梅兰芳、齐白石，可以不收。他们的材料很多，不必再重复。这里所收录的奇才差不多都是快被人们遗忘了的，有点像采珍珠或挖金矿，人家本来就光彩夺目，只是埋没多年，有待挖掘罢了。

奇人，差不多都有才有情有趣，或者三者兼有，或者必具其一。据此，奇人录必不难看，自有它独到的魅力和情趣。

奇人，不一定是怪人，当然，有怪癖的也不算少。可是，不应以怪取胜。

北京奇人，不一定是北京人，凡和北京有关的，对北京产生过影响的，都可以写。

这本书，只是开了一个头。够得上称为奇才的人物还有许多，可以陆续写下去，而且，他们的事迹也很丰富，甚至从不同的角度写同一个人都有好戏看。

再说，哪一位奇才不是一部好小说呢？

奇人的个性都非常突出，非常鲜明，无一例外。

如果一定要说他们有什么共性的话，那便是他们在某一方面必有超常的品格，甚至达到极致的程度，或极勤奋，或极认真，或极谦虚，或极执着，或极热情，或极严肃，或极老实，或极钻研，或极忘我，或极踏实……这种极度的发挥，或许，就是奇人们动人的故事背后包含着的有益的启示。

金岳霖先生

· 汪 曾 祺

60年代时，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上，人们常能看到有一位奇特的老人，他坐在一辆平板三轮车上，饶有兴味地看着街两边热闹繁华的商店，还有那来来往往的人流。

这位老人，就是北京大学的老教授，著名的哲学家金岳霖先生。

金岳霖先生是我40年代在西南联大上学时的老师——沈从文先生的好朋友，当时金先生也随清华大学来西南联大任教。沈先生当面和背后都称他为“老金”。大概时常来往的熟朋友都这样称呼他。关于金先生的事，有一些是沈先生告诉我的。

金先生的样子有点怪。他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当新学年开始，给新的一班学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他的眼睛有什么病，我不知道。只知

道怕阳光，因此他的呢帽的前檐压得比较低，脑袋总是微微地仰着。他后来配了一副眼镜，这副眼镜的镜片一只是白的，一只是黑的。这就更怪了。后来在美国讲学期间把眼睛治好了，——好一些了，眼镜也换了，但那微微仰着脑袋的姿态一直还没有改变。他身材相当高大，经常穿一件烟草黄色的麂皮夹克，天冷了就在里面围一条很长的驼色的羊绒围巾。联大的教授穿衣服是各色各样的。闻一多先生有一阵穿一件式样过时的灰色旧夹袍，是一个亲戚送给他的，领子很高，袖口极窄。联大有一次在龙云的长子、蒋介石的干儿子龙绳武家里开校友会（龙绳武的夫人是清华校友），闻先生在会上大骂：“蒋介石，王八蛋！混蛋！”那天穿的就是这件高领窄袖的旧夹袍。朱自清先生有一阵披着一件云南赶马人穿的蓝色毡子的“一口钟”（即斗篷。又叫“一裹圆”）。除了体育教员，教授里穿夹克的，好像只有金先生一个人。他的眼睛虽然到美国治疗过，但眼神仍不大好，以致走起路来有点深一脚浅一脚的。他就这样穿着黄夹克，微仰着脑袋，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联大新校舍的一条土路上走着……

金先生教逻辑，逻辑是西南联大文学院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班上学生很多，上课在大教室，坐得满满的。虽然在中学里没有听说有逻辑这门学问，但大一的学生对这课都很有兴趣。金先生上课有时要提问，但那么多的学生，他不能都叫得上名字来——联大是没有点名册的，于是他有时一上课就宣布：“今天，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这时，所有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就都又紧张又兴奋。那时联大女生以在蓝阴丹士林旗袍外面套一件红毛衣为时髦，穿蓝毛衣、黄毛衣的极少。问题回答得流利清楚，也是件出风头的事。金先生很注意地听着，完了，说：“Yes！请坐！”

学生也可以提出问题，请金先生解答。学生提的问题深浅不一，金先生有问必答，很耐心。有一个华侨同学叫林国达，操

广东普通话，最爱提问题，问题大都奇奇怪怪。他大概觉得逻辑这门学问是挺“玄”的，应该提点怪问题。有一次他又站起来提了一个怪问题，金先生想了一想，说：“林国达同学，我问你一个问题：Mr. 林国达 is perpendicular to the blackboard (林国达君垂直于黑板)，这是什么意思？”林国达傻了。林国达当然无法垂直于黑板，但这句话在逻辑上没有错误。

后来，林国达游泳淹死了。金先生上课时说：“林国达死了，很不幸。”这一堂课，金先生一直没有笑容。

有一个同学，大概是陈蕴珍，即萧珊，曾问过金先生：“您为什么要搞逻辑？”逻辑课的前一半讲三段论，大前提、小前提、结论、周延、不周延、归纳、演绎……还比较有意思；后半部全是符号，简直像高等数学。她的意思是：这种学问多么枯燥！金先生的回答是：“我觉得它很好玩。”

除了必修课逻辑外，金先生还开了一门“符号逻辑”，是选修课。这门学问对我来说简直是天书。选这门课的人很少，教室里只有几个人。学生里最突出的是王浩。金先生讲着讲着，有时会停下来问：“王浩，你以为如何？”于是这节课就成了他们师生二人的对话。王浩现在在美国，前些年写了一篇关于金先生的较长的文章，我没有见到。

王浩和我是相当熟的。他有个要好的朋友王景鹤，和我同在昆明黄土坡一个中学教书，王浩常来玩。来了，常打篮球。大都是吃了午饭就打。王浩管吃了饭就打球叫“练盲肠”。王浩的相貌颇“土”，脑袋很大，剪了一个光头——联大同学剪光头的很少，说话带山东口音。他现在成了洋人——美籍华人、国际知名的学者。我实在想象不出他现在是什么样子。前年他回国讲学，托一个同学要我给他画一张画。我给他画了几个青头菌、牛肝菌，一根大葱，两头蒜，还有一块很大的宣威火腿——火腿是很少入画的。我在画上题了几句话，有一句是“以慰王浩异国

乡情”。王浩的学问，原来是师承金先生的。一个人一生哪怕只教出一个好学生，也值得了。当然，金先生的好学生不止一个人。

金先生是研究哲学的，但是他看了许多小说。从普鲁斯特到福尔摩斯，都看。听说他很爱看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有几个联大同学住在金鸡巷，有陈蕴珍、王树藏、刘北汜、施载宣（萧荻）。他们住的楼上有一间小客厅，沈先生有时拉熟人去给少数爱好文学、写写东西的同学讲一点什么。金先生有一次也被拉了去。他讲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题目是沈先生给他出的。大家以为金先生一定会讲出一番道理。不料金先生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问：那么《红楼梦》呢？金先生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一个小动物。”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了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为得意。

金先生是个单身汉（联大教授里有不少光棍，杨振声先生曾写过一篇游戏文章《释鰥》，在教授间传阅），无儿无女，但是过得自得其乐。他养了一只很大的斗鸡（云南出斗鸡）。这只斗鸡能把脖子伸上来，和金先生一个桌子吃饭。他常常带着大梨、大石榴去和别的教授的孩子斗鸡。斗输了，就把梨或石榴送给他的这些小朋友，然后他再去买。

金先生朋友很多，除了教哲学的教授外，时常来往的，据我所知，有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沈从文，张奚若……“君子之交淡如水”，坐定之后，清茶一杯，闲话片刻而已。金先生对林徽因的谈吐才华十分欣赏。现在的年轻人多不知道林徽因。她是学建筑的，但是对文学的趣味极高，精于鉴赏，所写的诗和小说如《窗子以外》、《九十九度中》，风格清新，一时无二。林徽因死后，有一年，金先生在北京饭店请了一次客，老朋友收到通知，都纳闷：老金为什么请客？到了之后，金先生才宣布：

“今天是徽因的生日。”

金先生晚年一直在北大哲学系任教。他深居简出。毛主席曾经对他说：“你要接触接触社会。”金先生已经80岁了，怎么接触社会呢？他和一个蹬平板三轮车的约好，每天蹬着他到王府井一带转一大圈。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始时的那一幕。我想象金先生坐在平板三轮上东张西望，那情景一定非常有趣。王府井人挤人，熙熙攘攘，谁也不会知道这位东张西望的老人是一位一肚子学问，为人天真，热爱生活的大哲学家。

金先生治学精深，但著作不多。除了一本大学丛书里的《逻辑》，我所知道的，还有一本《论道》。其余还有什么，我不清楚，须问王浩。

我对金先生所知甚少。希望熟知金先生的人把金先生好好写一写。

金岳霖 湖南长沙人，生于1895年。1914年毕业于清华学堂，1920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26至1952年，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哲学系主任、教授，后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逻辑学会会长等职。1984年病逝于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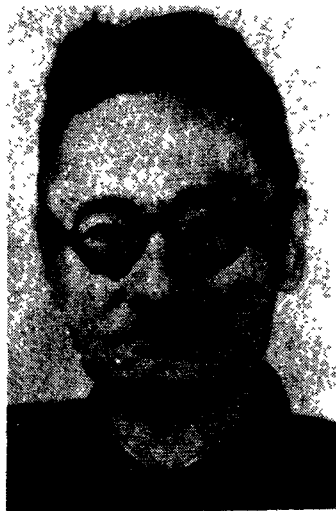
刘文典的故事

· 黄 延 复

前清华大学名教授刘文典先生（1889—1958），是我国当代最杰出的文史大师之一。他既是一位才高学广的“博雅之士”，又是一位恃才自傲的“狷介”之人。有许多关于他的奇特故事。尽管有些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不可能断定它们究竟有多少事实根据，但这些故事却令人信服地广泛流传着。因为它们和刘先生的性格、形象是那样地相符。所以当人们传播这些未经稽考的故事时，不但毫无恶意，而且还常常带有几分敬佩之情。当然，本文的撰述并不只着眼于这些奇特的故事，而是更多地着眼于史实。但既然它们是属于刘先生所“独有”的“特产”，所以有时也情不自禁地要部分地引述它们。个中虚实，明眼的读者自能鉴别。

“两个半”之一

刘先生的学术专长之一是古籍校勘工作。1923年，他的《淮南鸿烈集解》出版，受到学术界极大重视。胡适之先生先是破例用文言为其作序，曰：“叔雅（文典先生字叔雅）治此书，最精严有法。……其功力之坚苦如此，宜其成就独多也。”后又在其《中古思想史长编》中提到：“近年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收罗清代学者的校注最完备，为最方便适用的本子。”1939年，刘文典又



刘文典先生 黄延复提供

出版了《庄子补正》10卷（附《庄子琐记》），陈寅恪为之作序，云：“先生之作，可谓天下之至慎矣。……然则先生此书之刊布，盖为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之所必读而已哉！”但有一则关于刘先生自我评价的传说，则颇令人瞠目而置疑了：据说曾有人问起古今治庄子者的得失，刘先生慨而叹曰：“古今真懂庄子者，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我刘文典，第二个是庄子本人，其余半个……”（传说不一，一说是指日本某学者，这个意思是说，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知庄子者除我刘某人外别无他人；一说是指已故的马叙伦先生或冯友兰先生，因为他们二人都曾从哲学的角度讲授老庄，因此只能算“半个”。）

三易其地讲红楼

当年在联大，“红学专家”颇不乏人。但在业余开过“红楼梦讲座”者只有两位，一是大名鼎鼎的吴宓，一个便是刘文典先生。

他们的讲座各有千秋：吴宓往往是从西方文学理论得到启发，用现在一个时髦的名词就是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加以阐发。而刘先生的讲述则是“寓言式的”，多少带有几分“索隐派”的色彩。“见仁见智”，本可互为补充，但刘先生却常常有意无意地做出一种“唱对台”的姿态。有一则“刘文典先生三易其地讲红楼”的故事：刘先生原定在一个小教室开讲，后因人多改在大教室，还是坐不下，最后决定改在联大教室前的广场上讲。据一位曾亲聆这次讲座的学生回忆说，届时早有一大批学生席地而坐，等待开讲，其时天尚未黑，但见讲台上已燃起烛光（停电之故），摆着临时搬去的一副桌椅。不久，刘文典身着长衫登上讲台，在桌子后面坐下。一位女生站在桌边从热水瓶里为他斟茶。刘文典从容饮尽了一盏茶，然后霍然起立，像说“道情”一样，有板有眼地念出他的开场白：“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满筐！仙桃只要一口就行了啊！……我讲红楼梦嘛，凡是别人说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今天给你们讲四个字就够了！”于是他拿起笔，转身在旁边架着的小黑板上，写下“蓼汀花溆”四个大字。……（见马逢华写的《记西南联大的几位教授》，载台北《传记文学》52卷6期）另一位聆听者记述了刘先生对“蓼汀花溆”的解释：“元春省亲游大观园时，看到一幅题字，笑道：‘花溆二